

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LJYYWXXSWK

李中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风貌与文学精神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李中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风貌与文学精神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风貌与文学精神/李中华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6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ISBN 7-216-04306-5

I. 中…

II. 李…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5192 号

中国古代文学风貌与文学精神

李中华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346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3.87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6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7-216-04306-5/I·387

印次: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珞珈语言文学学术文库
编辑工作委员会

主 任:尚永亮

副主任:刘礼堂 陈国恩 张荣翼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礼堂 陈文新 陈国恩 张 洁 张思齐

张荣翼 杨逢彬 尚永亮 赵世举 骆瑞鹤

目 录

第一辑 学术思潮与文学风貌

汉魏学术思潮与建安文学的繁荣	3
魏晋名士文学的兴盛与衰落	14
唐太宗的文艺观及诗歌创作初探	37
李贺诗歌的艺术风格	46
李商隐“无题诗”的情感寄蕴	51
晚唐温李诗风评议	66

第二辑 封建政治与文人遭遇

从“三曹七子”到“二十四友”	
——试论魏晋文人集团与文学精神的演变	85
“竹林聚散”的历史考察	99
阮籍：人生苦闷的象征	114
——试论《咏怀诗》中的生命意识及其文学表现	
南齐皇权纷争与谢朓之死	130
评唐玄宗朝“吏治与文学之争”	
——兼论盛唐气象的形成及其历史意蕴	149
肃宗朝政局纷争与李杜的悲剧命运	165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	185
唐代贬官制度与不平之鸣	201
——试论开明专制下的文人遭遇与心声	

附:胡雪岩形象中的文化蕴涵	218
---------------------	-----

第三辑 宗教民俗与文学蕴涵

《楚辞》:宗教的沉思与求索	231
先秦招魂习俗与《招魂》	244
汉魏六朝文学中的道教境界	248
论葛洪及其《抱朴子》	256
李后主与“法眼宗”	289
融合·交汇·联姻	
——论宗教与通俗小说的文化联系	301

第四辑 文学观念与时代精神

赋心·诗心·词心·文心	
——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心灵化阐释	321
船山诗论中的艺术原则	330
论王船山的文学精神	355
王船山、顾亭林、黄梨洲文学观之异同	370
王船山《诗经》学面面观	383

第五辑 文学体式与考证

“屈原赋二十五篇”辨说	399
楚辞的文体界定与文体渗透	404
《木兰诗》考证	408
唐代七古、七言歌行辨体	419
“长庆体”考辨	424

晚唐“三十六体”辨说·····	429
-----------------	-----

后 记 ·····	437
-----------	-----

学术思潮与

文学风貌

與清之堂題詞
吳春海題
何定外題
百中一

汉魏学术思潮与 建安文学的繁荣

汉魏之际,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是一个大转折时期。在此之前,它经历了以尊奉“六经”为标志的汉代经学;在它之后,开始了以崇尚“三玄”为特征的魏晋玄学。建安时代,正是这一学术思潮转折的枢纽与关键。学术思潮的转移对于一代文人的心理构成、价值观念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建安文人呼吸着时代的学术空气,形成了特殊的文化心理,从而影响着文学的内在精神及艺术风貌,促成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与发展。

一、汉魏学术思潮转变之大势

汉代的学术思潮,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进入了经学极盛的时代。当时“上无异教,下无异学”,皇帝诏书、群臣奏议,莫不援引经义作为依据。连下层官员也多能推明经义,移易风化,号为“以经术饰吏事”^①。汉宣帝甘露三年,朝廷召集群儒,论定五经,皇帝亲临裁决,史称“石渠阁奏议”。汉章帝建初四年,朝廷又大会群臣、诸生于白虎观,考详五经同异,著为《白虎通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

义》。汉灵帝熹平四年,又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立在太学门外。这些旷世盛典,使得经学的势力笼罩全社会。

然而好景不长,经学极盛的局面在汉末大乱中迅速地崩溃了。探究经学衰落的原因,可以指出以下三条:第一,独尊儒术所造成的经学繁盛本是借助封建政治、尤其是皇权的提倡而出现的,它必然伴随封建政治的腐败、皇权的衰微而趋于没落。正如班固所说: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劝以官禄,尔后传业者愈盛,支叶繁滋,“盖禄利之路然也”^①。汉末宦官、外戚当权,朝政腐朽,经学被视为爵禄名利之途。学术文化成为封建皇权的附庸,学人失去了独立品格与创造精神,这种学术的没落便是必然的。第二,汉代儒术不同于孔孟的原始儒学,它与阴阳谶纬之说相糅合,带有宗教的性质。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汉人解经,多涉怪异。丰富、活泼的儒家文化被歪曲,经生专事章句训诂,严守家法,成为“守文之儒”。儒家被定为一尊之后,它又失去与其他文化思想互相竞争、自我调节、发展完善的学术环境,因而停滞、僵化了。第三,汉末党锢之祸,“志士仁人,多填牢户。文人学士,亦捍文网”^②。大批优秀的儒家知识分子被监禁、杀戮或屈死狱中,更多的知识分子遭到长达数十年的禁锢,成了推动学术思想剧变的现实契因。

概括起来,从内部看,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信的伦理原则和重视人道的积极精神被阉割,褪化为一种消磨、腐蚀文人心力的负累。解说一经,可以多至百余万言,“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③,学术文化成了人类精神的重负。从外部看,东汉王室的崩溃,使经学失去了依托。汉末学术思潮之不能不变,其原因即在于此。

① 班固:《汉书·儒林传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1040页。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

③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第595页。

从东汉王充、王符、仲长统等人的论述中,已经可以感到学术思想转移的迹象。王充治学“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与一般守文之儒全然不同。他认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他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①王符则说:“鬼神与人殊气异务,非有事故,何奈于我?”^②仲长统性格倜傥,每当谈及古今时俗,就发愤叹息。他的言论更为直截大胆,说:“知天道而无人略者,是巫医卜祝之伍、下愚不齿之民也。信天道而背人略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③这些,向汉儒的“天人感应说”提出了挑战。

这种转变中的学术思想,初时犹如涓涓细流,随着汉末大乱而泛滥为时代的主潮。思想界挣脱了经学的束缚,而呈现多种学术文化并存、互相融合的局面。

儒学衰落了,但它的影响依然存在。一方面,对于封建政治文化的批判使人们将朝廷视为污秽之地。另一方面,儒家崇尚气节的人格精神却因党锢之祸的激厉而被发扬光大。史载李膺被拷死狱中,门生故吏遭禁锢,侍御史景毅上书朝廷,陈明与李膺的关系,自表免归。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为是西州豪杰,以不得列名党人为耻,于是上表说自己曾荐张奂,是附从党人;太学生张凤等又曾为自己赴阙上书是为党人所附,所以应连坐受罚。党锢之祸中遭受迫害的张俭被朝廷追捕时,人们纷纷冒杀身破家之祸收留、保护。这些感人的事例,都表现着儒家崇尚气节、舍生取义的精神。同时,道家的兴起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思想倾向。道学本有排遣郁闷、调节精神的妙用,其超奇的艺术想象力尤为文人所喜爱。由

① 王充:《论衡·谴告》,人海人民出版社 1974,第 224 页。

② 王符:《潜夫论·卜列》,中华书局 1985,第 295 页。

③ 见仲长统:《昌言》,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卷八十九,中华书局 1958,第 955 页。

于时局维艰及儒家的没落,道家思想便弥漫于士人之间,表现为对生命的关注及神仙的向往。政治及军事斗争的需要,又使强调综核名实、赏罚必信的刑名之学应运而起。这里,各种学术思想的并存不是简单地互相排斥,而是互相制约又互为补充,成为一种新的综合体。

二、建安文人的文化心态

建安文人感受着同样的时代学术思潮,在文化心理上也呈现出若干共同或相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三点,即开放的心态、建功立业的思想以及蕴涵着艺术情调的人生态度。

在学术思想上,建安文人采取了一种比较宽松的、兼容并包的态度。如前所述,儒学中迂腐繁琐、不切世务的部分被抛弃,而重人格、尚气节的儒家精神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试以曹操为例。曹操年轻时曾上书为在党锢之祸中遇害的窦武、陈蕃鸣冤,言辞直切。建安八年,曹操又颁布《修学令》曰:“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他因此要求各郡国“修文学”、各县“置校官”,以使“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有益于天下”。在诗《善哉行》中,曹操歌颂古公亶父的“积德垂仁”、太伯仲雍的“王德之仁”,晏子平仲的“积德兼仁”,所赞美的人物及其语言都是儒家的。在《对酒》中,曹操描绘了自己的政治及社会理想:“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班白不负载”,“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以黜陟幽明,子养有若父与兄。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诗中展现的,不就是一幅儒家的太平盛世图吗?道家思想对于曹操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他曾在诗中想象自己“驾六龙、

乘风而行，行四海外”，幻想与赤松子、王子乔、西王母诸仙人玉女交往翱翔，得到长生不老的仙药。曹操还喜好道家养性之法，懂得各类方药，招引各地方术之士，无不毕至^①。曹操还受到墨家的影响。崇尚节俭、反对奢华，主张“兼爱尚同”，便都与墨子的主义相吻合^②。他又特好兵法，曾注孙武子十三篇，作兵书十余万言^③。至于尚法术，好刑名，更是曹操思想行事的一个重要特征。晋傅玄上武帝疏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又《文心雕龙·论说》曰：“魏之初霸，术兼名法，”便都是就此而言。

这种情况在曹丕、曹植身上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曹丕称帝的第二年，即下诏颂美孔子：“屈己以存道，贬身以救世”，是“命世之大贤，亿载之师表”^④。在诗中亦说：“得人则安，失人则危”，“明德通灵，降福自天”，可见儒家的影响。曹丕又有《折杨柳行》叙游仙之事。曹植除了儒道之外，还可能受到佛教的影响。

这便形成了一种开放、综合的心态。开放，即不排斥任何学术文化的合理因素、创造精神；综合，即兼容并包，不将任何思想定为一尊，而让它们互相调节、臻于完善。在以曹操为代表的建安文人那里，各种思想调和一体、各得其所：立身济世上，有儒家的道德人格；调节身心上，有道家的艺术精神；治国御军上，有综核名实、赏罚必信的法术；还有其他学术思想以为补充。

其次，建安文人多有建功立业的理想。汉末名士以天下事为己任，如陈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然而这种雄心却因封建政治严酷的打击而无法施展。一直到黄巾起义，汉廷被迫取消禁锢，积极用世之心才在士人中再度兴起。曹操年轻时便表现出非凡的志气与才干。据《后汉书·党锢列传》记载：名士首领李膺

① ③ 陈寿：《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第54页。

② 参见曹操诗《度关山》。

④ 陈寿：《三国志·文帝纪》，中华书局1959，第77页。

之子李瓚位至东平相，他在临死前叹道：“天下英雄无过曹操。必归曹氏！”另一个名士何颙初见曹操时，就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可知在当时，曹操已经被认为是汉末名士事业的继承者。“不戚年往，忧世不治”的精神，贯穿了曹操的整个一生。曹丕生于动乱之际，长在兵马戎旅之间，自幼便熟习弓马骑射，又纵览经史百家之言，当他被立为太子时，竟高兴地抱住丞相长史辛毗的颈项，问：“辛君知我喜不？”^①他虽然胸襟气度小于乃父，却常以古代的贤王明君自期。曹植的理想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而不屑于仅仅“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②。作为建安七子冠冕的王粲，在《从军诗》中有“不能效沮溺，相随把锄犁”的自白，而陈琳“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的诗句，则将这种壮怀吐露得更为明白直切。

其三，是通脱活泼、富于艺术情味的人生态度。

当经学独盛的时代，不仅学术的发展受到限制，文章辞赋成了经学的附庸，艺术尤被视为小道。经学的衰落，使文人能以轻松的态度对待人生，精神生活因之充实，而较富于艺术的情味。曹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③，“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④。他善音乐，才能技艺可与桓谭、蔡邕相比。又善围棋。他的书法笔力雄贍，《唐人书品》称“曹操书如金花钿落，遍地玲珑，荆玉分辉，瑶岩生灿”^⑤。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固然取决于曹操个人

① 陈寿：《三国志·辛毗传》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第699页。

② 曹植：《与杨德祖书》。

③ 曹丕：《典论·自叙》，《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中华书局1959，第90页。

④ 《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第54页。

⑤ 转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卷十七。

的气识才具,亦与时代风尚相关联。

有关曹丕、曹植的两则轶事可以使我们想见当时文人通脱、活泼的生活风貌。一则见之于《世说新语·伤逝》: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君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另一则见于《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魏略》:

(曹)植初得(邯郸)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耶?”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人。

这些举动抒情别致而脱略礼法,精神豪爽而风度翩翩,散发着新的人性及人格解放的气息。它们发生在曹丕、曹植身上,颇能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三、建安文学的新风尚

新的学术思潮的变化造就了建安文人的新心态,使他们在感知世界、认识人生、从事创作时表现出与汉代文士明显的区别。刘

师培曾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的缘由及风貌，概括为四条：“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这是第一条；“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悦。悦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这是第二条；“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骋词之风，肇端于此”，这是第三条；“汉之灵帝，颇好俳词。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这是第四条^①。四条之中，前三条均与汉魏学术思潮有关。

这就造成了新的文学风尚。首先，建安文学对于时代的反映更直接、真切，文学的现实性增强了。汉末社会动荡，人民痛苦已极，现实的悲剧不断地刺激着文士的心目。在他们的笔下便记录了许多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蒿里行》

洛阳何寂寞，官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

——曹植《送应氏》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①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第三课，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第 7 页。